

# 试论汉语复音化与语音简化的关系

杨 钢

汉语词汇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大变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探究导致复音化的原因，是汉语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学术界对复音化原因的理解是不完全一致的。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复音化是由汉语语音系统简化所致。这种理论认为，上古语音声母、韵腹、韵尾都较中古音复杂些，虽然还不了解唐末宋初的实际语音情况，但可以相信从第八世纪起，语音有两次很大的简化。单音词的情况如果不改变，同音词大量增加，势必大大妨碍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汉语的词逐步复音化正是语音简化的逻辑结果。今天闽粤各方言的语音比较复杂，复音词也就少得多，可以作为明确的例证①。

近年来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中古到现代语音固然是由繁趋简，但上古语音到中古语音则是由简趋繁，因此推测语音简化不是复音化的原因，而是复音化的结果②。可惜未进行深入明确的论证。

我们认为语音简化与复音化关系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以前只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到唐宋以后，对上古到中古复音词发展的状况及其原因缺少注意；二、把区别同音词视作刺激复音化的最重要的因素；三、对语音简化本身的原因缺乏研究。解决了以上三个问题，庶几可使二者的关系明朗一些。

对于上古汉语复音词的研究，现在已经出来了不少材料③。可以肯定，早在先秦，汉语复音词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而到汉代，复音词在汉语发展史上已经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准备以汉代作为座标观察语音与复音词关系的情况。因为取声韵发展相对稳定的这一时期对汉语构词法的情况进行研究，可以比较客观地揭示复音化的内在原因④。

如果同意《切韵》音系是以隋唐某一有影响的方音为基础，吸收了一些别的方音和古音成分而成（其中古音不是早于汉以前的上古音，而是反映在魏晋南北朝的韵书里，并保留在隋代的方音中），那么中古音应该是比上古音更为繁复的。以此判断语音与复音化的关系就比较简便。但我们宁肯不把讨论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因为对《切韵》音系的性质仍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汉代语音发展的实际状况则已经很清楚，同先秦相比，汉代声韵变化不大，主要是字的归部及某些韵部的音值发生了改变⑤。与此同时，汉语构词法正沿着三条路线发展：一、伴随词义发展，一词多义现象必然而且事实上成为汉语中的普遍现象，并且由此造成不少同形同音词。二、继续构造附加式、重叠式复音词。但在东汉前期比较接近口语

的《论衡》中，这两类词只占复音词总数的10%左右，其中不少还是从先秦继承下来的，同先秦相比，附加式下降77%左右，这是因为先秦几乎全部的前缀和大部分后缀都消失了。另外，重叠式也下降了50%。三、用结构造词法构造复合词，包括联合式、偏正式、补充式、支配式、表述式。这类词最多，占《论衡》复音词总词数的90%，比《论语》增多10.24%<sup>⑥</sup>。为什么第三类词最有发展前途？原因很简单，这就是因为用结构构造法构造的复合词的内部形式最鲜明，最能简明地表达复杂的概念与事物间相互的关系。而且，构造的手续也非常简便。它可以用一个理据显明的复合词的两个词根作基础，在不同的方向上向外拓展，从而孳乳分化出四个系列的复合词来。比方以“人民”为基础，就可以孳生出“民丁”、“民王”、“民天”、“民功”、“民曹”/“士民”、“鲜民”、“先民”、“小民”、“庶民”、“义民”、“黎民”/“先人”、“硕人”、“良人”、“重人”、“丈人”、“门人”/“人鬲”、“人庶”、“人妖”、“人海”、“人士”、“人舞”等一群偏正式的复合词来<sup>⑦</sup>。正是一个个这样的词群的集合，就形成了复合词在先秦占复音词总数的2/3、在汉代占复音词总数9/10以上的局面<sup>⑧</sup>。很明显，讨论复音化的问题，应该注重对复音化贡献最大的复合词的情况的观察，尤其应该注重对联合式和偏正式复合词形成原因的分析<sup>⑨</sup>。

沙夫说：“表达式的含混性，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形式是所谓的同音异义词，这代表一种不重要的情形……另一种形式是同声多义。同声多义就是：一个语词的意义随着上下文的意义而变化，在多种情形下的意义都是不同的但又相似的，从语义分析的要求这个观点来看，同声多义是更为复杂得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把一些含混的语词放在上下文中使它们的意义变得精确，或者通过清楚的说明某个语词实际上所应用的是它的哪一个可能的意义来消除上述两种含混，从而消除误解的危险”<sup>⑩</sup>。这种观点可以得到汉语史材料的支持。伴随词义发展，古汉语中的多义词和同形同音词必然增多。到了汉代，汉语中的基本词一般都不只一个义项，多义词已成为一种极普遍的现象。但过去人们往往强调同音词对复音化的刺激作用而忽略一词多义现象的影响。诚然，上下文可以给予多义词独一无二的价值。但由于古汉语简略的特点，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懈，人们在把握其价值时仍然常常出现偏差。在某种意义上说，多义词确能比同音词更能造成词义区别性特征的模糊，以致引起误解。《诗·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颜师古和朱熹都训“央”为“中”。王引之说：“夜未央者，夜未已也，今以未央为未中，则与下文不合，朝礼辨色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闻也。”《诗·大雅·文王》：“宣昭义问”。郑《笺》训“宣”为“偏”，非是。当按朱熹《诗集传》训为“明”。《国语》：“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韦昭注：“宪，法也，取善恶之法。”王念孙批评说：“法臧否之词不词，余谓宪者，表也，表臧否以示人”。再如“鄙”这个词在《左传》里已经具有小邑、边疆、野外、浅陋、轻视等意义，即便有前后文，人们在理解的时候仍然可能发生错误。如《左传·昭公二十年》：“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杜注：“计未得用，故进勇士以求于光，退居边鄙”。王念孙辩正说：“古谓野为鄙。鄙以待之，谓退处于野以待之也。故下文又言耕于鄙。《僖二十四年传》：‘鄙在郑地汜’。杜彼训鄙为野是也，此注以为边鄙，失之”<sup>⑪</sup>。单音的多义词其表义含混如此！郑、韦、杜、颜、朱这些训诂大师也时有失误。用复音词取代单音词已成了迫不容缓的事情。为了明确多义词的词义、排除意义不确定而引起的理解困难和误解词义的现象，汉语从先秦开始便出现了许多联合式复合词，用两个意义相同的词根

词素互相排斥对方的其他意义，钳制和固定对方的某一意义，形成一种新的区别性特征，使一词多义向“单义”回归。不过，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作为发展的环节、联系的环节的否定，既改变了单音节的构词格局，同时又保持了多义词的积极内容。从《左传》起，就已经产生了“边鄙”一词，《庄子》有了“朴鄙”，《战国策》又产生了“鄙野”；《汉书》有了“鄙陋”；钟嵘《诗品》有“鄙薄”……，这种用同义词“清楚的说明某个词语实际上所应用的是它的哪一个可能的意义”的办法，显然比诸如造累增字等办法要经济得多<sup>②</sup>。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合式的发展呈愈益增多的趋势<sup>③</sup>。

联合式复合词形成的前提，除了明确表义的需要外，还须有大量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存在。事实上，上古汉语已经有了丰富的同义词。《尔雅·释诂》仅和“大”同义的就有39个词。《尔雅》辑录和整理的同义词有4300个，其中通用的词语也有2000多个。这就为由同义为训过渡到构成同义并列复合词或直接构词准备了充分的条件<sup>④</sup>。我们知道，《尔雅》是经过许多人增补的，有些地方可能是东汉人增补进去的。而到《广雅》，不见于《尔雅》的词义又增添了300余条之多<sup>⑤</sup>。这说明同义词是逐渐丰富的。怎么丰富起来的呢？一个重要的途径，是由于词义的演变。比方“搜”和“寻”本来并不同义。《说文》：“寻，度人两臂为寻，八尺也”。因为“寻所以度物，故揣度以求物谓之寻”<sup>⑥</sup>。“逸”与“散”、“超”、“淫”等词原本也不同意。《说文》：逸，“兔谩掩善逃也”。后来引申出散失、超越、安乐、放纵等意义，才分别与“散”、“超”、“豫”、“淫”形成同义词并因此组合成联合式的复音词“散逸”、“超逸”、“俊逸”、“逸豫”、“淫逸”。由词义发展导致复合词的形成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仅以词的本义构成的复合词是很有限的。因此，一词多义现象既是引起联合式形成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又为联合式的产生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复音化的整个过程，与表达词义和词义的发展变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这正是汉语词汇内部自身规律的表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当然，由同义词结合而成的联合式并非仅仅为了使词义明确。有一类联合式实际上是两个“析言则异”的同义词的结合，合成后用来指称整类事物或现象，表示的是一种与词根意义相关而又增强了交际职能的新概念。《说文》：“驱，驱马也”，“驰，大驱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驱驰”，泛指奔走、放纵。《说文》：“谷不孰为饥”，“蔬不孰为饥”。《论语·先进》：“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饥馑”，泛指饥荒。“驱驰”、“饥馑”这类组合相当多，最初可能都经历过词组的阶段。后来，两个同义词各自突破义界所划定的外延，意义相互溶合，从而表现出一种浑然一体的新的意义。

还有一类联合式是由两个反义词构成。两个反义词如果经常被对举使用，有的会逐渐凝固成一个词，衍生出一种新的抽象意义。《汉书·五行志》：“中国既乱，夷狄并侵，兵革纵横”。“纵横”乃驰骋之义。《新唐书·王忠嗣传》：“乃营木刺、兰山，谍虚实”。“虚实”即情况。大量由词组向联合式、偏正式等复合词的过渡的完成，显然并不需要借助任何语音变化的外力。

王力先生在论述复音化是语音简化的逻辑结果时，举出虞：愚、谋：予、京：惊这三组上古本不同音而到中古始才同音的词作为同音词太多必然导致复音化的例证。实际上，由这六

一个词为词根的复合词许多在上古便已形成。例如“谋犹”⑦（《诗经》）、“谋面”（《左传》）、“谋府”（《庄子》）；“虞人”（《孟子》）、“虞官”（《诗经》）、“虞庠”（《周礼》）；“愚弄”（《左传》）、“愚鲁”（《论语》）、“愚菴”（《庄子》）、“愚闇”（《荀子》）、“愚戇”（《韩非子》）、“愚蒙”（《汉书》）；“京室”（《诗经》）、“京师”（《诗经》）、“京观”（《左传》）、“京牧”（汉代）、“京邑”（张衡《东京赋》）等等，这些复合词的产生很难说与谋、矛、虞、愚、京、惊语音上的合流有什么关系。晋代还产生了“愚昧”、“愚蠢”、“京华”、“京城”、“惊帆”、“惊悸”、“惊动”等复音词。唐代又有“矛盾”、“愚鄙”、“愚弟”、“京债”、“京剧”、“谋生”、“惊婚”；宋代有“京花”；清代有“京堂”、“京曹”、“京腔”、“京察”、“京饷”、“惊风”、“惊闺”、“惊燕”、“惊绣”等。以上这些词，只有联合式的“愚昧”、“愚蠢”、“惊悸”、“愚鄙”可能与区别同音词有一定的联系⑧。“矛盾”比喻事物互相抵触，表达的是一种新的抽象意义。其他的偏正式复合词则更与区别同音词无什么联系。因为“谋生”并不等于“谋划”之义，“京花”也并不等于国都，“生”和“花”都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音节符号，它们本身就具有截然不同于一词素的意义。“京花”、“谋生”都表达了一种全新的概念，绝非仅仅是为了使“京”与“惊”、“谋”与“矛”区别开来。质言之，即便“京”与“惊”、“谋”与“矛”、“愚”与“虞”在语音上不发生变化，“京花”、“谋生”、“愚弟”、“惊婚”、“京剧”（京都官职；剧，繁重之谓）等复音词依然会产生。其实，与这些复音词的形成有着天然联系的不是语音简化，而是汉语句子结构的发展。因为，在先秦至汉代各种结构关系被揭示和确立以后，为了明确表义，各种由结构构词法构造出来的复合词便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出来，使得到了唐代，复音词“已经非常丰富”、“出乎意外的多”⑨。既然如此，那么，把唐代以后才发生的语音的大简化视作复音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只见流而未见其源了。

当然，唐代以后复音词仍在大量增多，但这种复音化与语音简化的同步现象也可作如下解释：即唐以后复音词的增多与上古就已开始的复音化进程是一脉相承的。作为复音词主体的复合词主要是为满足更简明地表达日益繁多的复杂概念⑩、便于在交际中更容易把握构词理据和分化一词多义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是汉语词汇自身不容忽视的一种积极要求。而唐及唐以后丰富异常的复音词（主要是复合词）在客观上也具有区别同音词的功能。这样，某些音位就失去了辨义的价值，出现了音位的羡余现象，于是便发生了浊音清化、塞音韵尾失落等一系列语音上的简化过程。我们也就可以说明闽粤各方言语音之所以比较复杂，正是复音词比别的方言少得多的缘故。

值得注意的是，王力先生在力主语音简化为复音化主要原因的同时，也意识到有相反的可能性存在。他说：“复音词的大量产生，使汉语有可能不再依靠复杂的语音系统来辨别词义”⑪。不这样讲，语音何以要简化本身也就成了一种不可解释的现象。

综上所述，汉语词汇复音化的过程从上古就已经开始⑫。在语音未发生明显简化的汉代，由结构构词法构造的复合词继续大量增加，其原因，主要是为了更明确地表达日益增多的新概念和合理节制一词多义现象。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必然规律，是汉语词汇自身的要求。到了中古时期，复音词已经非常丰富，可以不再依靠复杂的语音体系辨别词义，这才出现了语音简单化的现象。

## 〔附注〕

①见王力《汉语史稿》第342页；

②见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载《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9月版。

③见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马真《先秦复音词初探》，马文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1期。

④王力先生根据张衡（78—139年）词赋确定公元一、二世纪的音系韵部为29部，声母同先秦相比估计变化也不大（见《汉语语音史》）。本文复音词的材料和统计数据主要取自东汉前期王充（27—约97年）的《论衡》，与张衡时代在时间上非常接近。

⑤参见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⑥根据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的统计。

⑦有许多复合词是由词组凝固而成的。本文例举的少数词语或是词和词组两可的，尚在凝固过程中，将不影响本文的论证。

⑧根据程湘清和马真文提供的材料统计。

⑨据程湘清《先秦双音词研究》及《〈论衡〉复音词研究》（载《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的统计。

⑩见沙夫《语文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350—351页。

⑪均见王引之《经义述闻》。

⑫王筠《说文释例》：“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

⑬据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统计，《论语》联合式占复音词的26.7%，《孟子》联合式占复音词总数34.5%，《论衡》联合式则占全书总复音词数61.04%。

⑭参见张世禄先生《“同义为训”与同义并列复合词的产生》，载《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3期。

⑮据殷孟伦先生《从〈尔雅〉看古汉语词汇研究》，载《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4期。

⑯《说文通训定声》。

⑰“犹”通“猷”。

⑱除了区别同音词而产生这些词的可能外，分化多义词、讲求语音上的节奏等可能性也存在。

⑲见王力《汉语史稿》345页。

⑳包括各种繁多的外来事物的概念。

㉑见王力《汉语史稿》207页。

㉒廖序东先生在《全文中的同义并列复合词》（中国语言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的结语部分说：“我们清楚地看出来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发展的总趋势，同时也知道汉语词汇单音词的双音节化是由来已久的。”